

评周作人早期对我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易竹贤 孙振华

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家,周作人尽管没有创作过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但他以小说批评、小说理论建设及译介外国近代小说等方面的实绩,为促进小说观念的更新,为新的小说美学意识的崛起,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小说艺术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文人目为“君子弗为”的小道,从来没有取得过诗文那样正宗的地位。真正把小说从奴婢妾小的地位解放出来,使其现代化,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事。这一突发性的裂变,当然与我国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滋养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在于“五四”文学先驱们,吸纳外国新潮,以新的小说美学意识对传统小说封闭体系的突破与超越。其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周作人。虽然他后来政治上有过重大的错误,他也没有创作过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但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家,周作人早期以小说批评、小说理论建设及译介外国近代小说等方面的实绩,为促进小说观念的更新,为新的小说美学意识的崛起,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批判“黑幕”“鸳鸯”派,为现代小说的发展清扫道路

近代小说创作的兴衰,品味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大体呈一致的步态。甲午战败后,梁启超肇鼓吹新民说,提倡新小说,曾有助于提高小说在文学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然而他们也把小说的作用无限地夸大,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①。随之而起的是作为启蒙宣传的“政治小说”以及“谴责小说”的风行。到了清末民初,政治、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使一些官僚政客和落魄封建文人心理失衡,他们从“趣”和“利”出发,“造作暧昧之事实,揭发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词多附会,有乖写实之义,语涉猥褻,不免海淫之讥”^②,使讽刺揭露性的“谴责小说”堕入“黑幕小说”的末流;言情小说则充满了柔靡艳丽的内容,多是“呼呼燕燕莺莺”、“嘻嘻卿卿我我”的陈词滥调,成为了一种公式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五四”前夕,“黑幕”、“鸳鸯派”小说流行甚广,拥有大量的读者,危害颇大。它们或借口攻击社会,大肆展览黑暗,宣扬其腐朽的内幕,简直成为教人堕落犯罪的“教科书”。或承袭传统小说观念,视小说为游戏遣兴的工具,并滋生了一层殖民地文化色彩的“拜金主义”文学观念。有的读者竟把这种“啸风吟月”的文人风流、腐朽的人生观,同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混为一谈,或误认为是“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为之辩护^③;吴宓等守旧文人则混淆写实主义与“鸳

蝶”“黑幕”小说的区别,以达其攻击新文化运动的目的^④。因此,黑幕小说,鸳鸯派小说的泛滥,已经成了“五四”时期小说现代化的阻碍。

“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李大钊、刘半农、傅斯年及茅盾等人,为建设新文学清扫道路,曾从不同的角度给“黑幕”、“鸳鸯派”小说以激烈的批评;而周作人的《论黑幕》^⑤、《再论黑幕》^⑥,可以说是这次“清道”斗争中最得力之作。周作人批“黑幕”的文章(他是把“鸳鸯派”小说一同加以批判的),具体涉及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与批评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挖掘了黑幕小说产生的“根苗”。他指出,从前流行的所谓“左文襄”、“彭刚直”的笔记小说,同讲“某生”、“某女”的艳情小说,“便是黑幕的根苗”;“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艳情小说与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便“大大的流行”。在文学观念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只晓得天下有一种闲书,看的人可以拿它消闲,做的人可以发挥自己的意见”。周作人对黑幕小说产生原因的探究,目光犀利,因而能正本清源,击中要害。其次,作者并不否认利用小说作工具对社会黑幕加以挞伐,但必须身负社会责任感,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作者认为,揭露黑幕“必用一副医学者看病的方法”,揭露是为了有利于疗救。“我们要将黑幕里的人和他所作的事,连着背景,并作一起观”,并且从中探究出“中国民族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何以做出这类不长进的的事来”,“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被社会造成”。黑幕小说却不是如此,作者本意“不是教训,便是讽刺嘲骂诬蔑”,小说成了“教训讽刺的器具,报怨私的家伙”^⑦。可见周作人相当重视文学的功利性,要求小说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第三,强调黑幕小说与写实小说的区别,大力张扬写实主义。作者认为真正的写实小说其主旨应是“寻求真实,解释人生”。对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的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作者倍加赞扬;而对展览黑社会疮疤、把人生的追求仅局限于“食”、“色”层次的黑幕小说,则给予坚决的否定:“黑幕不是小说,在新文学上并无位置,无可改良,也不必改良”。作者还进一步批评黑幕小说所谓“有闻必录”式的自然主义倾向,指出,“有闻必录”并不是写实,否则,“大清律例上的刑案与刑案汇览,都是事实,而且全是亲口招供,岂非天下第一小说?”因而他强调,小说写什么、怎样写,都要考虑到社会效果,“这所闻的事与社会无甚关切,也不必录”,甚至遣词造句,叙述描写也都要有利于正确的人生观的表达。在五四时期,人们大多还把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混为一谈,周作人却较为正确地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显然是难能可贵的,并有利于写实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此外,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作者也顺手一击,批判了以旧思想为灵魂,以旧形式为外衣的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鸳鸯蝴蝶派”的名称便最早见于周作人的这篇文章。

周作人这几篇讨“黑”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周作人对“黑幕”“鸳鸯派”小说的批评,尽管某些言论带有那个时代所难以避免的片面性,但在批判中扩大了西欧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推动了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探究,为五四时期小说的现代化起到了清扫与开路的作用。

鼓吹“人的文学”、“写实文学”,给现代小说创作以理论指导

清末至“五四”文学革命前,由于西方文学的影响,小说的价值观念也开始走向多元。梁启超、王国维分别代表了多元中的两极。在中国小说史上,梁启超第一次把小说列为“文学之最上乘”^⑧,这是对“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的传统小说观念的挑战。以梁氏为代表的理论

家,主张文学的功利性,重视小说“善”的特质,强调小说的社会意义,但这又容易失落小说本体的审美素质。与此相反,王国维主张小说非功利性的纯文学价值观,重视小说“美”的特质,反对小说成为“文以载道”、“惩恶劝善”的器具。他认为系于功利的文学,“决非文学”,“不足为真文学”^⑧,但这也容易陷入“趣”的泥淖。梁启超的小说价值观有利于使小说从“小道”、“末流”的偏见中解脱出来;王国维的小说价值观有利于使小说从庸俗功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们都陷入了片面的两极,然而这种“片面的深刻”,却成为小说向现代过渡的必要桥梁。而科学地把握小说的价值观念,兼顾小说真、善、美的特质,把小说的功利性与审美性并举,致力于小说内容与形式的革命,使小说艺术真正从古典阶段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则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其中,也有周作人的一份贡献。

1917年,当胡适、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向封建旧文化发起攻击时,周氏兄弟如异军突起。鲁迅以其内容深切、格式特别的现代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周作人则把清除旧小说的不良影响与提倡小说的全面革新结合起来,从1918年至1921年相继发表了《人的文学》等一系列重要论文,比较系统、切要地阐述了现代小说的理论主张。

首先,他强调思想内容的革命与艺术形式的革新两者缺一不可,尤为重视思想内容的革新。文学革命初期,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口号”,尽管也注意到了内容的革命,但实际运行的重点还在形式的改良与革新。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这种倾斜带来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1919年周作人发表《思想革命》^⑨一文,论述了思想革命在文学革命中的必要性。作者认为,“文学这事务,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因此作者强调“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那么思想革命的内容是什么呢?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⑩与1919年发表的《平民文学》^⑪,就是他对思想革命的具体阐释,正好补充了“八不”主张与“三大”口号中思想革命流于空疏的不足。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人的文学”口号,认为文学即人学,人的文学便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这种文学不但要描写人的平常生活,更应描写非人的悲惨生活。作者列举了一大批欧美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如易卜生的《娜拉》,莫泊桑的《人生》,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苔丝》,把它们列为“人的文学”的典范,与中国传统的反映“兽道鬼道”的非人的文学作鲜明的对照。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又明确地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周作人的这种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人的文学主张,对当时的小说创作影响是很大的。20年代形成创作热潮的问题小说、乡土文学,它们对人生问题的探究,对普通人生活境遇的关注,显然受这种人道主义文学主张的影响,要求小说创作切入人生、关心人生、走向平民化,差不多成了作家们的共同追求。因此,胡适称赞《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⑫。

其次,周作人从文学为人生的观念出发,大力提倡写实主义。1921年,由他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⑬,毫不含糊地宣称,“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在《人的文学》中,作者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排斥“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通过这种人道主义文学,“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在周作人的艺术观念中,文学创作已成为表现人生、改造人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他明显地倾向于坪内逍遥所倡导的写实主义和二叶

亭四迷的“人生的艺术派”文学,倾向于标榜新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白桦派小说,并希望从日本现代小说的诞生和发展中,找寻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道路,在“创造的模仿”中,建立中国的艺术为人生的文学。在另一次演讲中,周作人肯定俄国文学是“一种独创的文学”,是“理想的写实派文学”,其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能将“社会的背景反映在文学里面”,“由艺术界而影响于实生活”。作者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⑨周作人既看重写实主义文学的功利性,重视文学的善,更重视文学的真,强调以真挚的写作态度,如实的描写手法,反映真实的社会人生。作者不赞成那种把文学创作当作游戏,以“玩弄与挑拨”的态度创作文学的“戏作者”^⑩,主张“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以真实的态度描写“世间男女的悲欢成败”,表现“人的平常生活与非人生活”^⑪。在论述日本30年小说之变迁时,对于视有社标榜的“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批评他们“不重在真,只重在美,所以观察不甚透彻”,当然达不到为人生的艺术的高度^⑫。在《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⑬一文中,作者以宝黛恋爱悲剧为例,高度赞扬了曹雪芹敢于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精神,敢于打破1000多年来小说创作瞒与骗的大团圆结局的艺术胆识。

周作人既重视文学的真与善,同时也伴随着对文学本体特质的“美”的要求。“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⑭,可以说高度概括了周作人的这种美学主张。1920年1月,周作人在北京少年学会所作的《新文学的要求》^⑮的演讲中,也曾论及了文学真、善、美的关系。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鼓吹“人的文学”,宣传写实主义理论,促进了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探讨了文学与人生、文学的真善美、内容与形式诸方面的问题,兼顾文学的外在功能与内在的审美要求,深入到了文学的本体层次中。他的这些理论主张,对文学革命以后的小说创作,特别是对文学研究会一派的小说创作,在思想上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是相当明显和深刻的。

译介外国小说,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⑯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便是如此。

作为现代小说先导的近代小说,其观念的更新,新的小说美学意识的滋生,便与国外小说的移译紧紧联系在一起。清末,严复、林纾等人,从改良主义的政治需要出发,开创近代翻译事业,打开从西方输入民主科学思想和近代文学的窗口。在译介国外小说的影响下,近代小说创作的叙事角度、结构、时空观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促成现代小说的萌芽。但是林纾等人翻译的小说,虽不乏名家名作,却也多有二流以下作家的作品,且用文言翻译,“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⑰,有的甚至把外国作品“变成班马文章,孔孟道德”^⑱。这说明资产阶级维新派移译西方小说引起的小说改良远没有突破传统小说的格局。他们因阶级地位与文化素养的限制,还不可能摆脱传统的价值观念、心理构型、思维模式与表达方法。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批判封建“载道”文学,建设新文学的迫切性,使“摄取异域营养”的工作成了文学革命的一项紧迫任务。胡适认为,要建设新文学,要创立真正的白话文,必须先有白话的文学。这一方面要多向古典的优秀白话小说学习,更重要的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⑲郭沫若、茅盾等现代小说的建设者也认为“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因为“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这样才能创造时代的文学”^⑳。周作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从事外国小说翻译的。据统计^㉑,1904年至1926年,周作人共译了76篇小说;而在1918年至1921年短短的四年间,便译了54篇,大多是日本、俄国、东北

欧弱小民族的小说,发表在文学革命时期影响最广的《新青年》、《晨报副刊》、《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周作人曾明确地表白自己翻译国外小说的目的,是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提供借鉴。他说:“中国讲新小说也20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原因是“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象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想要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因此他认为,“目下切要的办法,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

周作人与其他许多先驱者的翻译,对当时的小说创作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封闭体系中输入了一种异质的因素,为冲破陈旧的小说观念与模式,提供了切实的利器。其中以反对封建专制,提倡人性解放为主题的异域小说,为我国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兴起。那时的作家们无论是对生活的观察与认识,还是对生活的表现上,都可以看到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及东北欧弱小民族文学影响的痕迹。同时,周氏兄弟提倡“直译”^②,这与林纾之辈“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国小说”^③迥异。他们主张借“直译”以输入与中国传统的小说语言异质的新词汇、新语法与新的思维方式,把思想的传播同改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古老的语言相结合,在当时文坛以及文化界,也是有广泛影响的。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曾指出,在建设的文学革命的几年间,“欧洲新文学的提倡”,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钱玄同也曾高度评价周作人的翻译,“在中国近几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④。由此可见周作人翻译外国小说,有着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评论作家作品,为现代小说护法引路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小说批评的开创者之一。无论是他的小说批评主张,还是他的小说批评实践,都牢牢地建筑在人道主义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既关注小说社会效应的追求,又不忽视小说本体品格的把握。比较集中体现周作人批评主张的有《文艺上的宽容》、《文艺批评杂话》、《批评的问题》^⑤等几篇论文。周作人主张一种多元化的批评模式,强调小说批评的印象鉴赏性能和批评中的宽容精神,认为这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反对“吹求”和“下法律的判决”种种不利于文艺创作繁荣的错误倾向。但作者决不是要湮没文艺批评中的是非观念。在《批评的问题》中,作者认为小说批评者不但要把好的作品推荐给读者,“但倘使不幸而有不好的著作出现,他也应该表明攻击”,“总括一句,批评家实在是文学界上的清道夫兼引路的向导”。从对《沉沦》与《竹林的故事》的批评,及对“问题小说”与“乡土文学”的提倡来看,早年的周作人在一定程度上确乎充当了文学界的“清道夫”与“引路的向导”,实践了他的批评主张。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沉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因“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⑥。然而有人批评《沉沦》是“不道德的文学”,极力贬低作品的现实意义。周作人坚决反对这种人以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作品,“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⑦。他从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出发,把“情欲”看成一种正常的人性,反对“灵优肉劣”及“超凡入圣”的假道学观念。作者肯定《沉沦》反映了“青年的现代的苦闷”,描写了“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及“理想与实社会的冲突”,它“虽然有猥褰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并称赞《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周作人对《沉沦》的批评,为当时的新文化人士所普遍

折服。他以人道主义、新的道德观作为衡量作品思想内容正确与否的标尺,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为新思想、新文学护法的勇气。

1925年,废名出版了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当时正是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过渡的时期。对于小说集所表现的与当时潮流不甚一致的冲淡平和的风格,有的批评者指责它是对现实的逃避。周作人在为《竹林的故事》所作的序^⑨中指出,他并不觉得《竹林的故事》是逃避现实的,大悲剧、大喜剧是现实题材,而“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也是现实。“乡村儿女翁媪的事”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周作人肯定作家的“平淡朴讷的作风”,认为他应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个性,“独自走他的路”。周作人的评论,尊重作家主体的独立个性,显示的正是艺术上的“宽容”精神,反对独尊一是的武断批评。这些意见对于小说创作的风格多样性发展,和小说批评的实事求是风气的形成,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问题小说”,是“五四”时代民主科学精神的哺育下,觉醒了的一代作家思考并观照社会人生的产品。在急剧的时代变革中,作家们试图以小说这种独特的工具,探讨、解释各种社会人生问题,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由于作家们“太热心于‘提出问题’”,太“热衷于‘人生观’”的讨论^⑩,往往以思想的探讨代替了艺术的追求,理性的思考代替了客观的描写,因而作品概念化的毛病便难以避免。对于“问题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周作人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周作人可以说是“问题小说”理论上最早的倡导者。早在1918年,他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不但率先提出了“问题小说”这一名称,而且对日本近三十年文学中的“问题小说”有所阐述,并持肯定态度。他认为,“问题小说”就是一种为人生的文学。1919年在《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中,他进一步明确界定,“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产物”,并把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名作《谁之罪》、《怎么办》、《安娜·卡列尼娜》作为“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加以推崇。而当“问题小说”一轰而起,成为当时小说创作的一种主要倾向后,周作人又及时指出它日渐显露出来的不足,是“太抽象化,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写出预想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局当然是一个单调。”^⑪“问题小说”之所以会流于空泛,症结就在于青年作家生活和艺术视野的狭窄,“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小小的一角”^⑫。周作人曾提出过“以自然主义的技术药中国现代创作界的毛病”^⑬,以自然主义的实地观察和客观描写来矫正“问题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向壁虚构与概念化的弊病。与此同时,周作人又以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变病”^⑭的负面影响。

怎样使小说创作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呢?1922年、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中指出,新兴文艺要克服抽象化的弊病,就必须摆脱一切束缚,“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就应该让“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些真知灼见,便成为烦赋于“问题小说”而兴起的“乡土文学”的理论依托。并且周作人还郑重其事地申明,他的见解并不是“执守乡曲之见”,“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而且他“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无视民族性空喊“世界的文学”,终将如无根之树,“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在20年代初期,周作人已预见到中国文学向民族化、世界化方向发展的必然走向,见解是相当深刻的。1923年以后形成创作热潮的“乡土文学”,显然受惠于周作人理论的影响。

“五四”文学革命退潮以后,周作人的艺术趣味渐渐滑向了“美”与“趣”这一边,到1927年后,他甚至完全否定了自己在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但这一切并不能抵消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为我国小说的现代化所作的贡献。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里,曾评价五四文学的先驱们说:“‘伟大的十年间’的一切文坛上的造就,究竟不能不

归功于许多勇士们的争斗和指示，他们在荆棘丛中，开辟了一条大路，给后人舒坦的走去。虽然有的人很早的便已经沉默下去了，有的人竟还成了进步的阻力，但留在这一节历史的书页之上的却仍是很可崇敬的勇敢的苦斗的功绩。”用这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不也是很恰当的吗？

注 释：

①⑧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②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

③ 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新青年》第6卷第2号。

④ 吴宓：《写实小说之流弊》，《中华新报》1922年10月22日。

⑤⑩⑬⑭ 见《每周评论》第4、11、5、2号。

⑥ 见《新青年》第5卷第2号

⑦⑬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见《新青年》第5卷第1号。

⑨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⑪ 见《新青年》第5卷第6号

⑬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⑭⑮⑰ 参见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⑮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晨报副刊》1920年11月15、16日。

⑯ 见《人的人学》

⑰⑲ 见《平民文学》

⑲ 见《晨报副刊》1920年1月8日

⑲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95页。

⑳㉑ 《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载《新青年》第4卷第3号。

㉒ 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谈龙集》。

㉓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㉔ 郭沫若：《文艺论集·一个宣言》，茅盾：《我走过的路》（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㉕ 参见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

㉖ 参见周作人《汉字改良与礼教》，《新青年》第5卷第6号。

㉗ 钱玄同：《关于新文学三件要事》，《新青年》第6卷第6号。

㉘ 见《自己的园地》、《谈龙集》、《谈虎集》。

㉙ 郭沫若：《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㉚ 仲密：《沉沦》，载《晨报副刊》1922年3月26日。

㉛ 见《语丝》，1925年10月12日，第48期。

㉜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自己的园地》。

㉝㉞ 1921年周作人致沈雁冰的书信，转引自沈雁冰致周志伊信，载《小说月报》第13卷6号。

（责任编辑 张炳煌）